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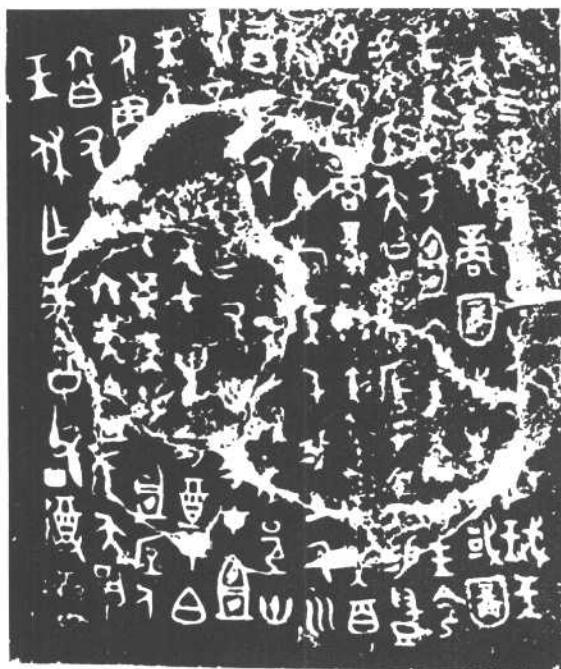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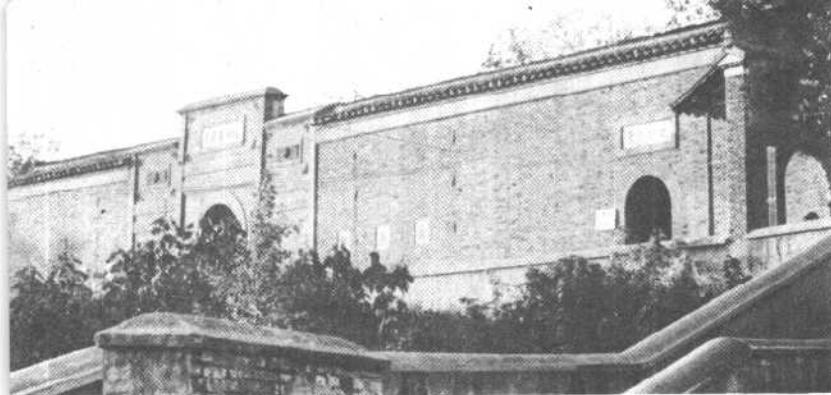
镇江史话
ZHENJIANG SHIHUA

宜侯矢簋



宜侯矢簋铭文





北固山 甘露寺



“天下第一江山”石刻



甘露寺铁塔下出土唐李德裕墓舍利金棺银椁函



镇江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玉烛



李德裕重瘗禅众寺舍利石函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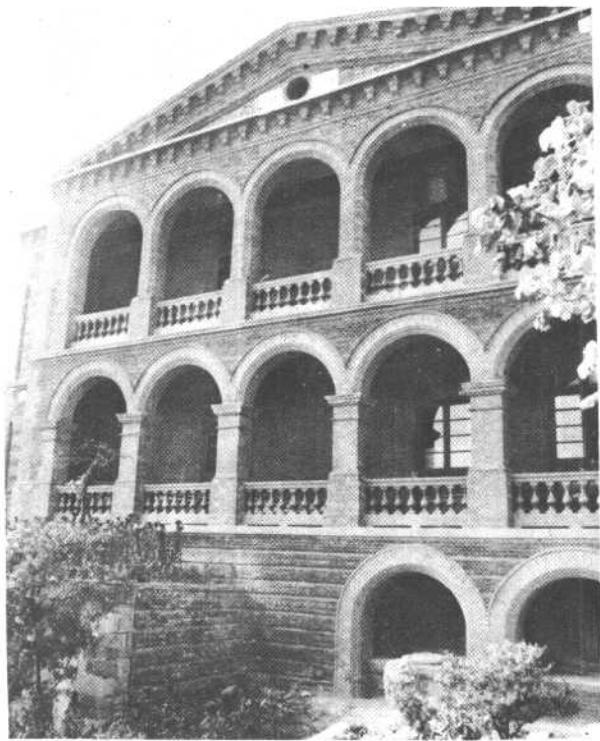


镇江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酒令筹

道光鸦片战争时期宋城铁炮



原镇江英国领事馆主楼（1890年重建）



目 录

一、镇江市地理形势概述	1
二、镇江地名沿革与城池变迁	13
三、远古到南朝时期的镇江城市发展	24
四、隋唐五代时期的润州治乱	46
五、北宋承平时期的京口山水与名流	75
六、宋金对峙中的镇江	101
七、元蒙统治下的镇江	123
八、明代统一与镇江	145
九、清初的镇江战事	162
十、康熙、乾隆屡巡镇江	173
十一、鸦片战争镇江之役	179
十二、太平天国革命与镇江	194
十三、镇江英租界始末	202
十四、辛亥革命，镇江光复	208
十五、清代镇江经济与文化	220
十六、五四、五卅运动中的镇江民气	230
十七、国民党统治下的江苏省会	238
十八、抗日战争时期的镇江	243
十九、光明来到了镇江	251
后记	259
附：镇江史事年表	260

一、镇江市地理形势概述

“一水横陈、连冈三面，做出争雄势。”这是南宋爱国词人陈亮的一首《念奴娇》词中的名言，是作者当时亲历镇江对此地江山形势的准确概括。陆游在其《水调歌头》词的起句中也说：“江左占形胜，最数古徐州”，这个古徐州，不是江苏北部的徐州，而是长江南岸的镇江。镇江一向有“南徐”的别称，从来是江山雄伟的形胜名区。

镇江市位于横流江苏省中部的我国第一大川长江下游南岸沿江冲积平原及其附近的黄土阶地上。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道大运河在这儿与长江交会。航道西接南京、东通上海，北连淮泗，南达杭州。沪宁铁路穿过市区的西南郊，距南京仅一百二十里，火车一小时可达。公路不仅连接邻近区的丹徒、丹阳、溧阳、溧水、金坛、句容、武进、宜兴、高淳、扬中各县，而且沟通四乡八镇，深入农村；渡江北去，又成为苏北运河线上和里下河各县的出入孔道。因此镇江是一个交通方便的水陆要津。

镇江又是一个冈峦起伏的丘陵地带。宁镇山脉自西而东，仑山、高骊山等耸峙句容、丹徒交界；十里长山绵亘镇江西南，黄鹤山、小九华山、京岘山等俯瞰城郊；金山、北固山峙秀江滨，东西相对；焦山孤悬江心，风景称最；云台山、宝盖山屏蔽市西商业区，城内还有“三山五岭”之称。向东六十里外的江边，则有圌山、五峰山等形成江防要塞。镇江以南

的丹徒、句容、金坛三县交界处有茅山山脉盘亘其间。镇江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江山胜地。

镇江水土深厚，物产丰饶，远古便有人类居住，逐渐发展成为江南名城，现今更加繁荣发达。全市（包括谏壁区）约一百一十七平方公里，其中城区面积二十二点四平方公里，郊区面积六十九点三八平方公里，长江水面二十五点五八平方公里，总人口三十四万余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

镇江市的发展，历史上主要是靠航运交通，下面先将长江和运河关系镇江发展的历史情况作些简要的介绍。

洪流浩荡话京江

长江的下游一名扬子江，是因为江流经过北岸扬州的扬子桥（今属邗江县）和扬子县（今仪征县古名）而得名。其流经南岸镇江的一段别名为京江，又称丹徒江。唐代徐坚等编写的《初学记》上说：“长江有别名，则有京江；江带郡县则因以为名，则有丹徒江。”实际上，丹徒江一名早已见于东汉人王充的《论衡·书虚篇》说：伍子胥恨吴王，驱水为涛，“今时会稽、浙江钱唐、丹徒大江皆立子胥之祠，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京江之名是后起的，当始于六朝，是受了京口名称的影响而连及的。南朝宋人山谦之的《南徐州记》佚文便提到了“京江，《禹贡》北流也”。到了唐人诗歌中，京江一词更为屡见不鲜，如许浑的《思丁卯村》诗：“吁嗟楼下水，几日到京江？”杜牧的《杜秋娘诗》：“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

这一段所谓京江的水道，是从西面丹徒县的高资江面到东边武进县的孟河口，计长二百五十余里。南岸一面共有九

条宣泄山水入江的港道，据清代镇江乡土地理学家严元燮的调查研究：自西而东，第一港是高资港，第二港是七里港，第三港是京口港，第四港是丹徒港，第五港是谏壁铁锚港，第六港是孩溪港，第七港是柳港、黄港等滨江小溪，第八港是洪溪港，第九港是圌山旁的山北港。此外还有郭家港、徐家港、姚家桥港等可通潮汐，资以灌溉农田。其中第三港属今镇江市区，其余均在丹徒县境。京口港就是平政桥下通过京口闸的老运河河道。京江水确是滋润镇江大地、孕育镇江城乡经济文化的肥美的乳液。

京江的江面古代是很阔的。六七千年前，长江就是在镇江的东面入海，以后由于河流挟带泥沙的冲积关系，沧海变为桑田，江口才逐渐东移，形成了土地肥沃的今长江三角洲。秦汉时京江的巨潮很著名，《文选·枚乘〈七发〉》注引《南徐州记》说：“春秋朔望辄有大涛，声势骇壮，至江北，激赤岸，尤为迅猛”。隋唐以前，镇江、扬州之间的江面尚宽四十余里，江潮可通扬州城下，瓜州是江中的一个小沙岛。后来由于长江主泓道南移于南岸一带，瓜州逐渐淤涨，同扬子桥连成一体。唐代江面束狭一半，宽仅二十里，以后瓜州继续扩大，宋代江面就只有十八里。到了清初，瓜州镇江之间的江面更加狭窄，只有七八里了。乾隆时著名扬州文人汪中就曾设想过在瓜州与对岸镇江之间架设浮桥。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清道光年间），长江主泓道北移，北岸瓜州转为崩塌，宋代建设的瓜州城在光绪元年（1875）大部沦入江流，同时镇江一边的江岸开始淤涨，靠近南岸的江中小岛金山，到清同治年间已与镇江江岸相连，成为陆岛。时至今日，金山以上的江岸又向北推进了三公里。东流的长江到了江阴以下才又逐步开阔

起来。

长江是一条横贯祖国东西的大动脉，洪波万里，轮舟上下，水上交通极为便利。京江水西接汉沔，东注大海，自古以来，舟楫航行不绝。记述上古三代地理的战国时著作《尚书·禹贡》记扬州的贡道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那时江淮未通，须沿江入海，再自海入淮泗。秦始皇三十七年(210)的最后一次东巡，是从长江中游的云梦地区涉江而下，“过丹阳(今南京)，至钱唐(今杭州)，入浙江”，回程从会稽(今绍兴)，“过吴(今苏州)，从江乘(今句容县北龙潭附近)渡，并海上，北至琅琊(今山东沿海)”。西汉初年，枚乘上书吴王刘濞劝止其叛乱道：“汉知吴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黄头，循江而下，袭大王之都。”五臣注：“羽林、黄头，皆水战者也。”可见那时即已有长江水师可以从上游直下今南京、镇江一带。写镇江、南京间航行的有六朝人颜延之《从车驾京口游蒜山作一首》中的“春风江涛壮”语，《文选》五臣注：“其还也转水路，发丹徒。”描绘这条航道极为形象具体的是唐代大诗人李白送孟浩然的一首七绝：“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从海道入江，溯流而上直达镇江，历史上也有不少事例，如东晋末年，浙东的孙恩农民义军，曾以楼船千艘、义军十万，破沪渎(今上海)入长江，一度登陆于京口的蒜山，并占有了扬州。宋代，海南商船往往经镇江到扬州贸易，苏轼有诗道：“东来贾客木棉裘，饮散金山月满楼，夜半潮来风又熟，卧吹箫管到扬州。”今天从汉口到上海的定期航轮必经镇江停泊，上下客货。

镇江与扬州隔江相望，济江而渡，尤为便捷。可是在古

代的交通条件下，横渡长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两度伐吴，亲临广陵（扬州）都因眼前横亘着天险长江，知难而退。但在历史上，广陵京口之间乘船往返仍是络绎不绝，不是天堑长江所能隔绝的。秦末农民大起义，陈胜部下广陵人召平渡江至吴（苏州），说服项梁、项羽叔侄起兵反秦，项羽亦率八千子弟兵渡江而西。这是镇扬交通的第一次记载。

唐以前人多从瓜步（在今长江北岸六合县境）渡江。开元二十三年（734），润州刺史齐澣开扬州伊娄河（即瓜州的新河），始将渡江出发点移至京口埭下，直趋对岸瓜州，路近而免漂溺之患。这京口埭一名西津渡或蒜山渡，从此以后，镇扬船路全由这条捷径，直到今天仍是如此。现在过江赴扬，有两条航道，一是从江边七号码头上渡轮到六圩登岸，再换乘汽车到扬州；一是乘汽车从金山古渡口直下渡轮过江，在瓜州古渡口上岸驶抵扬州，时间只一小时左右，真是一衣带水，方便极了。

由于大江主泓道从上个世纪起已经北移，北岸不断崩塌，南岸江滩淤出，港口的淤塞日益严重，大型江轮已不能直接停靠码头，现已在镇江东面六十里的大港另建深水码头。

流贯江南古运河

镇江在地理上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是长江下游南岸的城市，还在于它是处于大运河同长江的交会点上，南北东西，航路四达，形成了特殊优越的地位。

大运河即京杭运河，简称运河，是全国也是全世界最长

的一条人工开辟的河渠，它北起北京，南至杭州，经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一千七百九十四公里。它以长江为界，可分南北两大段。长江以北，从北京起，顺流是通惠河（北京市区到通县）、北运河（通县至天津）、南运河（天津至山东临清）、鲁运河（临清至台儿庄）、中运河（台儿庄至江苏清江市）、里运河（清江至扬州）等六段；长江以南由镇江市经常州、无锡、苏州至浙江杭州市的一大段叫江南运河。镇江上承南下过江的里运河，是江南运河的起点。古代，江南富庶地区的粮食物资主要由这里过江北运，北方的特产也经过这里输送到江南各地，镇江确实是南北交通的门户枢纽，今天也仍然不失为南北物资交流的一处中转地，担负着镇江、扬州、淮阴、盐城、苏州等地区的物资和旅客中转任务。

与镇江最有关系的是江南运河。江南运河，人们都说是隋代开通的。《通鉴》卷一八一《隋记》五：大业六年（610）“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大业是隋炀帝的年号。南宋陆游的《入蜀记》也认为“自京口抵钱塘，梁陈以前不通漕，至隋炀帝始凿渠八百里，皆濶十丈，夹冈为连山，盖当时所积之土”。其实，在隋唐以前早就有了江南运河的雏型。《史记·河渠书》载：“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浸。”古代的三江，指松江、婺江、东江，位于太湖以东。五湖均在太湖平原（具体名称说法不一）。可见早在春秋时期，北抵长江、南达钱塘江，贯通三江五湖，已有渠道可通，而这渠道就是江南运河的前身。根据《越绝书·吴地传》记载，这条运河可能是从苏州到江阴、常州以北入江达于扬州。公元前487年（鲁哀公九年），吴王夫

差争霸中原，在广陵城侧开邗沟，引江水北通射阳湖，西北至于淮安县北末口入海，以通粮道。江南河渠的开凿应该在开邗沟以前。另外，吴越之间，当时亦有渠道相连，越王勾践的两次伐吴，都是取道水路，打向苏州。

但是在这期间，还没有一条直接通往今镇江入口的人工河道，有之，则从秦代开始。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润州丹徒县：“初，秦以其地有王气，始皇遣赭衣三千人凿破长陇，故名丹徒”。又记丹徒县：“本云阳县地，秦时望气者云有王气，故凿之以败其势，截其直道，使之阿曲，故曰曲阿。”前此张勃的《吴录》及顾野王的《舆地志》也均有类似记载，足见秦始皇曾于此间冈陇进行开凿。当然，所谓“王气”之说是一种迷信之谈或托词，实际上是始皇要在这里建筑驰道和开辟运河，便于其东幸巡游，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政治军事控制。南朝宋刘桢的《京口记》又记始皇凿断丹徒京岘山前龙目湖中的长冈，“今水北注江矣”，更可证凿冈与开河有关，从此，“丹徒水道通吴会”（《南齐书·郡县志》）。从京口到苏州的水道即已通航。同时秦始皇又发会稽卒从槜李（今嘉兴市，江南运河所经）到钱塘治“陵水道”（人工渠道），苏州以南至钱塘江的渠道当时亦被开通了。

从孙吴到南朝，建都建业，为了避免江南漕赋经由京口到首都要经历长江风涛之险，另行开辟一条由句容直接通向金陵的人工渠道。孙权曾使陈勋凿“破冈渎”，使“航行不复由京口”，“东郡船舰不复行京口”。梁时又废“破冈渎”而立“上容渎”。两渎路径略有不同，而都是由句容经丹徒、丹阳交界处的宝堰，过赤山湖而至南京。

隋统一南北，建都长安，南京不再是政治中心而为普通

郡邑，才又恢复了由京口入江的水道交通。炀帝大业六年敕开江南运河是在秦代已开河道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拓宽。所以《乾隆镇江府志》说：“京口有渠，肇自始皇，非始于隋也。……炀帝初非创置，不过使宽广耳。”纠正了前引陆游之说的错误。开拓江南运河以及北方的永济渠和邗沟是隋代统一全国的形势的需要，并不一定只是为了皇帝个人的享乐遨游。但由于隋是一个短暂的王朝，杨广又是著名的荒淫的君王，因此客观上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开河事业反而成了他的一条罪状。大运河的作用到以后各代才充分显示出来，所谓“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元和郡县志》）。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作诗称赞江南运河“平湖七百里，沃壤二三州”。确实，江南运河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便利了水上交通，而且配合着太湖平原水利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繁荣，所以南宋詹体仁说：“浙右之有漕渠，非止通馈运、资国信往来而已，苏、秀、常、润四州之高仰（仰）者实赖之”，说明了运河与农田灌溉的密切关系。

开凿运河主要是古代劳动人民的功绩。这条江南运河的工程，从镇江至丹阳间的一段最为艰巨。孙吴时期曾命岑昏督率民工“凿丹徒至云阳，而杜野、小辛间皆斩绝陵墓，功力艰辛”（《太平御览》引张勃《吴录》），原注：“杜野属丹徒，小辛属曲阿。”据后人考证，杜野即杜墅，在今镇江市东十五里；小辛即辛丰，古属丹阳，后划入丹徒境。这一段河道，又名夹冈河，是由于河床开辟在山冈之间而获名，水浅舟滞自然是必然的现象。西晋末年在丹阳开练湖，东晋初年又开新丰湖，均与运河为邻，使运河水量得到调剂。但由于灌溉与水运之间的矛盾，丹徒运河段仍不免有浅涸之患。谢灵运诗有“朝日发云

阳，落日到朱方”句，丹阳、丹徒间虽然只有短短六十里路，行船却需要整整一天。隋炀帝整理江南运河，使宽十丈，而揆诸实际，这一段恐未必尽然。

特别从市口经市区到老南门外过猪婆滩的一节，地势高昂，河身又十分狭窄，船只最难通行，虽有京口闸放江水入河，但在落潮时刻，群舟拥塞，进退维谷，满载漕粮北上的船只往往是排队候出，要耽搁很多时日。“东南百万斛，每岁取途于此”，确实够艰难了。历代地方当局虽也经常修浚，时兴时废，多半是劳民而无功。清光绪年间在镇江知府赵雨楼的建议下曾一度改将漕船由丹徒港的横闸过江，获得成功。但这位太守的改革措施也因其不久去任而废除。从清末到民国，直至抗战以前，镇江至常州间的运河节节淤塞，久已失去了航行、灌溉的功用。

全国解放以后，运河回到了劳动人民手里，古河才获得了新生。1959年起，疏治大运河纳入国家重要建设计划，各段运河节节疏浚，江南运河的起点也移于谏壁，最为合理了。同时从市西江滨经里运河而通苏北各地的小轮畅通无阻，镇江航运比过去更为发达。

江山千古形势伟

大江横陈，群峰环抱，形成镇江的重要地理形势。宋人汪藻曾说：“千山所环，中横巨浸，形胜之雄，控制南北。”陈亮也指出：“京口连冈三面而大江横陈，江旁极目千里，其势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他把镇江的地势比作出洞的老虎，说明它在军事上居于可攻可守的有利地位，是兵

家必争之地。《读史方舆纪要》引《江防考》云：“京口西接石头，东至大海，北距广陵，而金、焦障其中流，实天设之险。”

秦汉及其以前，全国的政治重心在西北，长江下游一带尚未完全开发，此地的江山形势也未为人所注目。三国吴孙权时才在此地筑铁瓮城，号曰“京城”，作为东吴建国的基础，后改都建业。从此京口成为六朝首都的屏蔽，祖国东南地区的重镇。杜佑《通典》说：“京口因山为垒，缘江为境，建业之有京口，犹洛阳之有孟津。自孙吴以来，东南有事，必以京口为襟要。京口之防或疏，建业之危立致。”后来的历史证明，镇江与南京之间，的确有着这种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

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起兵京口，消灭桓玄，发展势力，取代东晋王朝，京口地位显得愈加重要，城市建设也有所发展，《宋书·文帝纪》说：“京口襟带江山，表里华甸，径途四达，城邑高明，苞总形势，实维名都。”《齐书·州郡志》也谓这里“望海临江”、“内镇优重”。隋统一南北，大将贺若弼就是率军先占京口再下金陵而灭陈朝的。

唐朝安史乱后，北方凋残，东南地区比较安定，唐中央的财赋收入全靠南方各地维持，当时的润州便成为江淮转输要地。后来更在此地设置镇海军，关系到整个浙西的安危。

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建都临安(杭州)，与北方的金国对峙，长江天堑成为边防前线，镇江地方经常驻扎重兵，控扼江口，同时也是南宋境内的一处交通财赋要区。乐史《太平寰宇记》说：“京口西距汉沔，东连海峤，为三吴襟带之邦，百越舟车之会。”

元蒙灭宋，镇江江面上两军的水师大战，也是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之一。

元末，朱元璋起义师，克复金陵后即下镇江。由此南进，消灭了盘踞苏州的张士诚；再渡江北伐，长驱进入大都（今北京），元顺帝仓皇北遁，结束了元蒙近百年的统治。

元明清三代俱建都北京，首都军民和皇宫的粮食全要从南方运去。为了南粮北调，加强漕运，大运河完全畅通，南方来的漕船可以直抵河北通县。镇江是长江运河交会的漕运枢纽，地位更加重要。清初郑成功军打着恢复明室的旗号，曾由海上发兵进入长江，首先夺取了瓜州和镇江。郑军大将甘辉、潘庚钟等论议形势道：“瓜、镇为南北咽喉，断瓜州则山东之师不下，据北固则两浙之路不通。”他们认为长期据守镇江，不仅“南都（即南京）可不劳而定”，并且可以“观衅北都”，也就是说等候和利用清政府在粮食来源断绝以后可能产生的一系列内变。这时期的镇江形势已不仅关系到东南局部地区，而是与全国的形势呼吸相通了。

到了近代，海上交通发达，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垂涎中国这块肥肉，沿海地区都成为他们侵略的孔道。殖民强盗特别垂青镇江这块地盘，认为占有镇江就可以封锁运河口，“置北京于死地”。中英鸦片战争的后期，1842年英舰队闯入长江，经过激烈的战斗攻破镇江城，而后包围南京，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随后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进一步逼迫清政府同意开镇江为商埠，强立租界。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时期，镇江是天京的外围，先由太平军镇守数年，清军拼命包围夺走，太平军又转而包围困守镇江的清军，直到天京沦陷，镇江始终处在激烈的战火当中，称得上是“东南锁钥”。